

持证6年 她促成12例人体器官或遗体捐献,让生命以特殊方式获得新生和延续

何伟红:我愿做生命的摆渡人

■本报记者 雷晓燕 叶承慧 文/图



何伟红(右)向黄江荣母女介绍器官捐献事宜。

她对冉光明妈妈说的第一句话,依然是“你有什么需要帮助”。

冉光明妈妈接受不了现实。何伟红不放弃,一边陪着安抚情绪、安排食宿等,一边适时宣传人体器官捐赠的意义。到了傍晚,冉光明妈妈接受现实,被何伟红真心实意的帮助和换位思考的态度感动了,最后表示愿意捐献儿子的有用器官。

待完成所有的流程,已经是凌晨三点了。何伟红说:很累,但很值得。

这不是结束。第二天,何伟红紧接着联系交警和律师,给予冉家法律等援助,在最短时间帮忙妥善处理好后事。

这是她最难忘的协调经历。

家属从不接受现实,到愿意捐献儿子的有用器官,何伟红做了大量工作。感谢冉妈妈,心怀巨大悲痛,还能选择去帮助别人。既然死亡已经不可挽回,让儿子的生命在别人的身上得到延续,对她来说,也是一种安慰。她事后分析。

做协调员去促成捐献有技巧,但最关键的,还是用心、用情。

今年,丽水一名27岁的退役军人在宁波打工时突发脑溢血,生命进入倒计时。得知消息后,何伟红一边与宁波的协调员联系,让对方介入;一边为退役军人发起众筹。

他家境普通,救命钱基本是借来的。不管怎么样,出现生命奇迹当然最好。如果情况不妙,希望以情打动家属,尽力促成捐献。

数天后,该退役军人去世,除了心脏,其他有用的器官都捐献了出来。

何伟红介绍说,那次众筹,共筹得善款6万多元。最后虽然没有挽救那条年轻的生命,但家属因为协调员的帮助,对他们充满了感激。

我是一名生命的摆渡人。其实,社会各界更应该感激捐献者和他们的家属。正因为他们的大爱,才有了这么多生命重获健康,让一个个家庭再现欢笑。她说。

全国第207974位 她报名志愿捐献人体器官

何伟红感动了别人,也被许多人感动。

一位身患肿瘤晚期的中年人,忍着剧痛,用颤抖的手在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表上写下名字;一位得过红十字会救助的松阳老农,特意来到何伟红的办公室,签下捐献志愿登记表;一对签了捐献志愿登记表的老夫妇,发动了多对老人进入捐献的队伍。

在松阳,完成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的人越来越多,目前已有622人登记在册。这一切,归功于宣传。

何伟红介绍说,只要到社区、农村等地办事,只要参与急救培训,她总会忍不住插一嘴,花上10分钟、20分钟,大力宣传人体器官捐献的相关情况和意义。

有一次她在松阳县城城东社区宣传,一名老人高兴地说,他早就想捐献人体器官,就是不知道去哪里登记,这下好了,找到组织了。

松阳只要实现了一例人体器官或遗体捐献,当地媒体都会进行大力宣传报道,助力器官捐献工作。

去年,松阳县城部分公交车站出现了人体器官捐献的公益广告,来红十字会登记捐献的人猛增;

所有这些,都在说明宣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何伟红说,她眼下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建立人体器官捐献志愿队伍,深入城乡和厂矿社区进行广泛宣传,提升群众对器官捐献的认知度。

不接受,没关系,接受了,当然更好。接受有个过程,哪怕个人进步了一小步,社会文明就进步了一大步。她笑着说。

做协调工作累了,何伟红就打开手机,看看自己的捐献登记卡。早在2018年8月,她就报名志愿捐献人体器官,希望在身后捐献出所有有用的器官。而在她的影响下,她的姐姐也成为了这支队伍的一员。

那时,她是全国第207974位捐献志愿登记者。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网站,这个数字每天都在增长。3年后,截至2021年10月28日,这个数字已变成了3940826。

做协调员这条路,很难走。做协调员6年,何伟红发出这样的感慨。但,当她看到捐献志愿登记者大幅度增长,全身又充满了力量。

最近,何伟红得知有两位签署过捐献志愿书的松阳人生命进入倒计时。于是,她在胸口别上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的胸牌,再次出发。

姐姐,我的头发又黑又长,能捐献吗?10月26日,坐在轮椅上的脑瘫患者黄江荣歪着头斜着嘴,认真地问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何伟红。何伟红对记者说,那一刻,她被感动到想哭。

那一天,黄江荣和她的母亲蔡春梅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表上,分别郑重地签下了名字。黄江荣在百年之后,将捐献出全部有用器官和组织,包括脑组织。

彼时,何伟红觉得自己这份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志愿工作,光辉而伟大。

不拿一分报酬坚持6年不言悔,因为她觉得意义重大。

黄江荣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在身后能够捐献全部有用器官和组织,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以另一种方式获得新生,去自由奔跑,去结婚生子,去体验全新的人生。

黄江荣今年48岁,江西九江人,是先天性脑瘫患者,整日与轮椅为伴,没有上过学,也没有结过婚。平时里,她靠着电视打发无聊时光。通过电视,曾多次看到捐献人体器官的宣传,并于2008年萌发了捐献的想法,帮助别人,也是帮助自己。

村民不理解,知道后议论纷纷,说黄家要卖眼角膜。母亲蔡春梅为了不造成更大的误解,死活不愿意在当地红十字会送来的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表上签字。

2016年,黄江荣和妈妈、妹妹到松阳生活。在日复一日的潜移默化中,母亲终于想通了。

蔡春梅说,政府给女儿办了低保,每月发放补贴。除此之外,每月还有1000多元的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前段时间,女儿胃出血住院,住院费用全部报销。党和政府对女儿的恩情无法回报,就想着把这份恩情,回报给社会。

10月26日,母女俩笑呵呵地在登记表上签下名字后,黄江荣突然问了一句,我的头发能捐献吗?化疗病人老是掉头发,他们需要我的头发。何伟红鼻子一酸,连忙告诉她,头发不是人体器官,不能捐献。

美丽的心灵令人感动。

2012年,何伟红调到松阳县红十字会工作。2015年,听说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很难考,她想挑战一下自己,于是报名参加了相关培训。她坦言,那是继高考之后,最难的一次考试。幸运的是,她顺利通过考试,拿到了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证。目前,丽水市仅三名协调员。

这是一份志愿工作,没有一分报酬,且需要手机24小时开机。当得知有人临近死亡,要小心翼翼地与家属沟通,总是想方设法为病人提供各种帮助,并适时宣传人体器官捐献的意义;当做完家属思想工作后,要及时通知专家评估组和获取组,协调医院、家属等各方关系;当器官获取后,还要忙前跑后,帮助家属处理善后事宜。

经常忙得头都晕了,还是在坚持,因为意义重大。她说,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献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和唯一的合法来源。据统计,每年我国约有60万人在等待器官移植,但仅有1万多人能获得器官移植的机会,存在巨大供需缺口。

何伟红说,人的生命很宝贵。她做协调员,也是在发扬人道、博爱和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况且我也喜欢帮助别人。

亲历最难协调,坦言多换位思考是成功秘诀

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不好做,话难听、脸难看等现象时常遇到。何伟红却说这没什么,协调有技巧,多换位思考,就能让协调顺畅很多。所以,每次接到任务,在和病人家属说明自己的身份后,我的第一句话,不是“要不要捐赠器官”,而是“你有什么需要帮助”。

四川大学生冉光明来松阳打工,不幸遭遇重大车祸。听说消息后,何伟红马上穿上协调员工作服,赶到医院向医生了解病情。得知对方出现脑死亡情况后,



何伟红指导市民填写相关表格。



拿到捐献登记卡,黄江荣(左)很开心。

